



李子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归侨赤子



“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归侨赤子李子芳。

海外赤子归国从戎

李子芳的父亲李兹璇早年出洋谋生,在菲律宾与友人合开了个杂货商店,家中小有积蓄。李子芳5岁时丧母、6岁时丧父,家庭生活逐渐陷入贫困。1924年,李子芳随父亲生前好友到菲律宾继承了父亲留下的遗产,以半工半读形式进入岷里拉中西学校读书,再不愁吃穿。在此期间,李子芳接触到进步书报,决意为国家振兴崛起而奋斗,并于1927年春天回国。当不愿他再过苦日子的姐姐劝他回菲律宾时,他说:“菲律宾再好也是番仔(编者注:闽南语,指外国人)的,中国再穷再弱也是中国人的祖国。”他还说:“俗话说,父母不嫌子女丑,子女不嫌父贫穷。既然咱的祖国这样穷,这样弱,凡是有志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她争气立志,振兴崛起。”

回国后的李子芳先后进入泉州培元中学、晋江中学、黎明高中读书,进一步攻读《共产主义ABC》《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由于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触怒了反动当局,李子芳被迫学期未满离校,后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组织,在泉州、厦门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克漳州城,随后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武装。李子芳于5月经厦门互济会介绍,在漳州石码参加红军,被分配在红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任统计干事。

李子芳,1910年出生于福建晋江永宁乡(今为石狮市永宁镇)岑兜村,1932年5月参加红军,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是我党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海外华侨的光荣与骄傲。

政治组织工作知人善任

结讲话中说:“陈赓、李子芳同志成绩最好,都得了满分,另各加10分,以资奖励。”此事,足见李子芳不仅重视学习马列主义,并且把马列主义学习得很好。

由于在工作中展现出卓越的才干,在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李子芳被提拔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国共合作抗日后,南方八省游击队奉命组成新四军,党中央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新四军的各级领导,李子芳也于1937年10月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在任内,他知人善任、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有一次,华侨战士陈子谷找到李子芳,汇报其接到两个叔叔要他回泰国继承祖父遗产的来信,自己感到刚穿上新

四军的军装就要回泰国不大好。有的同志怀疑陈子谷此一去也许就不再回来了。李子芳则认为,对于爱国华侨知识青年应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李子芳趁开会的机会,当面向叶挺军长提议,让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回泰国去为新四军募捐,同时处理自己的遗产继承问题。叶挺军长采纳了他的建议。陈子谷回泰国后,为新四军募捐了一笔款子,并卖掉了自己应得的遗产,凑成一笔巨款,寄到了新四军。3个月 后,陈子谷又回到了皖南新四军政治部。1982年,肖华将军在怀念李子芳的文章中指出,李子芳具备了红军政治工作人员“严谨、缜密、细致、泼辣”的优良素质,是个优秀的红军政治工作者。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监狱和石底监狱。

李子芳被关押到石底监狱后,立即提议建立狱中秘密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根据当时形势和斗争环境,他要求大家对严酷的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强调“只能在斗争中求生存,放弃斗争就会落入敌人的陷阱”,提出“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有出路”的革命口号。关于斗争的前途,他提出要力争越狱,设法逃出去为党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时也要作好不能越狱的最坏打算——“斗争到底,准

备牺牲”。

1942年5月,日寇大举进攻浙赣线,进逼上饶。国民党撤离上饶之前,给李子芳吃了一碗放有毒药的面条,因药剂不够没有致死,他们又用绳子将其勒死就地掩埋。

1997年,在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南面山坡下,李子芳烈士家乡所在地人民政府捐资兴建了一座六角形琉璃瓦翘檐式亭子,取名“子芳亭”,以纪念其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和永不消逝的斗争精神。

(据《学习时报》)

拾遗

“登龙门”和“跳龙门”是一回事吗

“登龙门”与“跳龙门”,意思大致相同,是由同一个民间传说衍生出来的两种说法。

我国古代民间有一传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没有开凿,伊水流到这里便被龙门山拦住,在山南积聚出一个大湖。这时黄河中生有一群鲤鱼,它们听说龙门山的另一面风景非常美丽,就想去看一看,于是便沿着黄河支流洛河游进伊水,但游到龙门山前却被拦住了。鲤鱼们便商议跳过龙门山,其中一条大红鲤鱼特别勇敢,自告奋勇第一个跳。它使出全身力气纵身一跃,到了半空中,置身于空中的云雨之间;它奋力前移,途中还被天火烧了尾巴;它历尽艰难,最终越过了龙门山,落在了山南的湖中。一落入湖中,这条大红鲤鱼便化为一一条龙。伙件们看到这个情形都吓坏了,不敢再去跳。这时龙飞到空中,对它的伙伴们说:“你们也跳过来呀!这样就可以成为龙,再也不会被水所困。”于是,剩下的鲤鱼们便努力学习着大红鲤鱼的样子,试图跳过龙门山;但结果只有极少数能跳过龙门山变成龙,其余多数都在半空摔下去,额头上也落了一个黑疤,直到现在也能看到。

这个传说,在汉代辛氏的《三秦记》有记载:“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也。”清代文人李元的《螭范·物体》一书中说得更为翔实:“鲤,昔者每岁季春逆流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唐代大诗人李白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赠崔侍郎·其一》)

科举考试艰难,成功率极低,其难度绝不亚于鲤鱼跳龙门。不过考中进士之后,这些士子就会身价倍增,高官得做,倒也是一般人不敢企望的。因此,人们便用“跳龙门”“登龙门”比喻进士及第,暗指其极高的难度和士子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唐代文人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记·贡举》云:“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也留下了“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的句子。(据《西安晚报》)

古人为何尊老师为“西席”

我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吕氏春秋·尊师》说“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所以尊师也”。韩愈在《师说》中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古代对教师的尊称很多,如夫子、山长、先生等,西席便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尊称老师为“西席”呢?

我国古代席位尊卑有君臣和主宾两种。君臣之席取南北向,皇帝在上朝时坐北朝南,即面南称帝,面北称臣。主宾之席则取东西向,主人出于对宾客的尊敬,自坐东位,即面西而坐,“东家”之称由此而来;而让客人坐西位,即面东而坐,西位为尊位。家塾教师和官僚们的幕客,都称为“西宾”,又称“西席”。所以古人尊称授业解惑之师为“西席”。

据史载,汉明帝刘庄自从当上太子,就跟博士桓荣学《尚书》。刘庄即位后,依旧尊重桓荣,以师礼相待。他曾经亲自去太常府(桓荣已封太常)探望,让桓荣面东而坐,摆好桌案和手杖,召百官和桓荣弟子数百人来行弟子礼。明帝这样做是要为天下树立表率,向社会倡导一种尊师重教的风气。清人梁章钜在《称谓录》中说:“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故师曰西席。”

古典文学作品里也常把老师称为“西席”或“西宾”。唐代柳宗元在《重赠二首》中有诗曰:“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写道:“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梅三该敬一杯。’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近现代依然用“西席”来尊称老师。近代诗人王益初的《贺友恢复教学工作》中写道:“西席重登崇宿望,皋比坐拥更唐皇。”(据《天津日报》)

“不肖子孙”并非指不孝顺的子孙

现在,人们常常将“不肖”和“不孝”混用,“不肖子孙”因此也就理解为不孝顺的子孙。其实,“不肖”和不孝顺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说文解字》载:“肖,骨肉相似也。”什么叫“骨肉相似”?肉可见,骨不可见,因此“肖”这个字不仅形容外表的相似,更用以形容本质特点上的相似。许慎接着解释说:“不似其先,故曰不肖也。”不像他的祖先,因此叫“不肖”。在为《礼记》所作的注疏中,东汉学者郑玄解释说:“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郑玄的意思是说子不如父。子不如父,因此“不肖”引申为不成材的意思。

《礼记·射义》载:“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中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射箭的人怎样使射箭和音乐相配合?又怎样使音乐和射箭相配合?按照音乐的节拍发射,发射出去而正中靶心的,大概只有贤者才能做到吧!如果是不肖之人,他哪里能够谈得上射中呢?孔子这段话中“不肖”就是不贤、不成材的意思。

《庄子·外篇》中《天地》一章,有关于“不肖”更清楚的解释:“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则谓之不肖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孝子不奉承他的父母,忠臣不谄媚他的国君,这是大臣和人子中品德最高的。父母说的都认为对,做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不肖之子;国君说的都认为对,做的都认为好,这就是世俗所说的不肖之臣。

清代学者王应奎所著《柳南续笔》中有“不肖子”一条,其中写道:“今世人丧中用帖,称‘不肖子’。”父母死后,儿子在居丧期间自称“不肖子”,这并不是自称不孝顺,其实乃是谦词,是自谦不成材的意思,跟不孝顺的“不孝”同样毫无关系。(据《天津日报》)

中央苏区时期的医疗卫生事业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解决苏区军民的看病问题,组织创立了专门的医疗机构,并迅速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政府的卫生管理体系。

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卫生部,下设总务处、医政局、保健局、卫生材料厂、医院政治部。苏区政府设立卫生管理局,专门负责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设立卫生管理局,下设药品药材科。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卫生管理局将药品药材科升格为药品管理处,主要负责苏区药品药材的生产、供应、调拨、管理、检查与监督工作。

为了加强药品药材管理,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卫生部先后颁布《卫生运动指南》《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文件,对药物购销、生产、使用、保管、发放、供应、监督等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从1933年起,中央苏区各级地方政府成立了卫生运动委员会,省、县设立卫生部,区、乡设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员,管理辖区的卫生行政、卫生建设和卫生教育等事务。

为了培养药品专门人才,红军卫生学校(前身为军医学校)每期招生都会招收药剂、司药专业学员。中央药材局也多次举办药品材料加工生产培训班,苏区卫生部门为此组织人员编辑印发了大量包括有药理学知识介绍的教材。受训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

中央红色总医院成立后,除有诊察室外,还设有手术室、药房、化验室、中草药制剂车间、放射室等。医院除收治病人外,还自行生产、制作一般的卫生材料、中草药剂等,化验有关药品的性能与质量,防止中毒受害。此外,中央苏区还先后建立了10所后方医院、10所预备医院、6所兵站医院,2所残废医院和1个疗养院,约能收容伤病员两万多人。这些医疗机构内都有专门的药品药材管理科室。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卫生材料厂。该厂克服重重困难,很快生产出丸、散、膏、丹各类药品以及酒精、敷料、手术刀、镊子、钳子、打丸机、压气机、蒸汽消毒机,并将产品分送各红军医院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医疗器械和药材供应困难。(据《人民政协报》)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有一枚正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的印盒。这是一个铜镀铬的印盒,长10厘米,宽4.5厘米,高2厘米,做工精致,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出现处处斑驳,但在光线的照耀下整体还闪烁着银光。

查阅红军在云南的历史,在目前的史料记载中曾经有两支带有“滇”字番号的红军游击队活跃在云岭高原,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另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是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派人到云南省富宁地区发动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创建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位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南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也是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1930年6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奉命返回右江筹建红二十一师,在右江坚持革命斗争。

1931年8月,中共右江特委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作战。1931年11月,右江特委派黄庆金、李德惠率领部分红军到滇桂边区活动。1932年底,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后,右江下游党组织又陆续派六十二团干部和地方主要骨干进入滇桂边区工作,组建了600多人的游击队。1933年5、6月,中共右江下游党委又派一批干部进入滇桂边区协助工作。至1934年初,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已由中心区的富宁发展到广西的靖西、那坡、德保、西林、百色等县的部分地区。1935年后发展到广南、麻栗坡。仅富宁就建立劳农会21个,赤卫队27个,赤卫队人数达2600多人。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如



“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印盒。

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形成了全区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历经近8年的艰苦战斗,鼎盛时期,游击队和赤卫队发展到8000多人枪,根据地面积达滇黔桂的28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80多万人,英勇抗击了滇黔桂三省反动武装10余次“围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主力接受改编北上抗日。部分红军干部战士根据中共广西工委“右江今后党的工作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继续开展隐蔽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富宁解放。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使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则与长征有关。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立即调整战略方针,改变行军线路,一渡赤水,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战术部署,其中包括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周恩来亲自参加红军纵队动员会,并明确游击

纵队的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是建立根据地。2月12日,留下组建游击队的红军指战员与红军主力分手之后,组建成立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7月上旬,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军川南游击队与黔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活动于川滇黔边区。

游击纵队在三省边区积极开展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主动寻敌作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向川南游击。国民党军队以为还有一支红军主力留在川南,十分惊慌,急调川军以大量兵力,对纵队进行堵截。蒋介石更深恐红军纵队在川滇黔三省边区立足,创建根据地,亲自调集云贵川大量兵力对纵队发动多次三省“会剿”。面对数倍、数十倍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跟追堵击,纵队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包围长宁县城,奔袭川南重镇安宁桥、梅硐场等20余个乡镇,攻取四川筠连、贵州赫章县城,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威胁泸州、宜宾、毕节等要地,这样,纵队在三省边区拖住大量敌人,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and 红二、六军团的转移。1936年9月,游击纵队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把在云南威信一带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编改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

1936年秋,川滇黔三省国民党军队集中重兵对红军游击纵队进行了连续3个月的大规模“会剿”,游击纵队奋勇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到同年底不幸失利。虽然游击纵队主力失败,但以云南支队为代表的红军游击支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47年。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播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种子,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近10万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据《学习时报》)